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探究

王效, 王燕

(安徽工程大学 思政部,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既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也是一个由被压迫到通过革命获得解放的过程;既是一个中西文化碰撞的过程,也是一个救亡和启蒙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引领中国人民选择并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

关键词: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47(2016)01-0025-03

Research on the Society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a

WANG Xiao, WANG Yan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u 241000, Anhui, China)

Abstract: The society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a is both the course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 and that from the oppressed to the liberation through the revolution, and also is both the course of the cultural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and that of the salvation and enlightenment, in which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t theory with the Chinese reality, finds the approach to the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guides the Chinese people choose and stride into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of China.

Key words: modern China; society transformation; modernization

近代以来,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为一切社会变革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历史背景,各阶级的革命努力都在这样的一个幕布前展开。但是由于民族危亡的紧迫感、阶级矛盾的尖锐化、社会思潮的多样性,社会转型的整个过程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局面。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发动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并成功地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对于这样的一个历史变革,不同时代、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提出各种不同的观点,这些不同观点主要表现为现代化与革命化之争,启蒙与救亡之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之争。考察这些观点对于认识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认识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道路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现代化转型中的革命化

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对社会发展方向的确定、难度的估量都出现过不同的意见,这导致中国社会转型所经历的波折也特别多。对于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的分析也存在着两种范式:一种是传统的革命化的分析范式,另一种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现代化的分析范式。传统的革命化分析范式基本上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所描述的保持一致。这种分析范式认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

不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由于中国地域庞大和人民的反抗斗争,加之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没有哪个帝国主义国家能够完全把中国变成其独占的殖民地,从而导致中国出现四分五裂的局面。对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帝国主义则采取了与封建势力相勾结的方式,共同镇压中国革命。帝国主义的入侵在破坏中国自然经济基础,破坏城市手工业和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同时,又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瓦解中国封建经济基础的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在这些变化过程中,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勾结又压迫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样,中国革命的性质就不得不是为资本主义发展开拓道路的民族民主革命。又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这种特殊的资产阶级革命,毛泽东把它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发展前途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现代化的分析范式逐渐兴起并引起了很大反响。学者们从各自不同的学科角度对现代化进行了阐释。罗荣渠认为:一方面,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一场剧烈变革,工业化是这一变革的推动力,这场变革导致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全球性的转变,

收稿日期:2015-07-10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等教育提升计划省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及其当代意义研究(TSSK2014B20);安徽工程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2014YQQ008)

作者简介:王效(1972—),男,安徽舒城人,安徽工程大学思政部讲师,博士。

王燕(1980—),女,安徽岳西人,安徽工程大学思政部讲师,硕士。

工业主义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社会变化;另一方面,现代化是落后国家采取各种高效率途径,通过对自身进行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文化,带动广泛的社会变革,以迅速适应现代世界环境和赶上先进工业国的过程。^{[1]17} 罗荣渠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待近代中国面临的社会转型,他希望能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并利用这个分析框架对一个多世纪的中国社会变革给予新的历史定位。在这样的现代化视角里,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从阶级斗争转变为生产力的发展,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中心内容。而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这个主题进行的,这是一个历史的大趋势。^{[1]490}

然而,当我们用现代化的视角去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转折时虽然“突出了以生产力标准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客观主导标志”,但也不能否认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这场革命也是生产力标准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表现,而就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它更是不可避免的表现形式。而且,革命作为上世纪前半叶世界历史的主题之一,必然要主导中国共产党在解决中国问题、实现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思维方式。革命化的框架就是压迫与反抗、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这样一种逻辑结构。这种逻辑结构在战争年代无疑是必要的和有效的。当然,在建国以后,没有及时转变的革命化思维惯性也给新中国建设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尽管如此,我们在分析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也不能以现代化模式否定革命化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这个过程应该是一个总体的、长期的现代化过程,其局部的短期的表现则是革命化。

二、社会主义化取代资本主义化

有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化,因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进步性,一切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推动资本主义产生的力量和活动,都应予肯定;中国近代社会演变的本质过程是资本主义化,即封建经济结构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邓小平曾经说过,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前面还有“社会主义”四个字,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2]138} 所以,现代化也存在着一个社会制度环境的问题,尽管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制度是实现现代化的主导模式,但是,中国的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可以实现现代化。

中国社会对于现代化的追求从鸦片战争时就开始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比较开明的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主张,“洋务运动”就是一种对现代化的追求。但是这种努力实质上是希望在不从根本上变革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化,是在封建制度环境下的现代化,这种努力明显跟不上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步伐,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

资产阶级改良派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实行君主

立宪,推进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但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根基薄弱和封建势力的强大,最终也遭到挫败。由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辛亥革命成为压倒封建帝制的最后一根稻草,其意义重大,其缺陷也同样明显:由于反动势力的强大和革命领导者自身的软弱,它没有力量完成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的果实最终被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并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夺去。但此时的中国,一方面仍然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的阶段,资产阶级掌握着革命的领导权;另一方面,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够,无产阶级还没有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中国缺乏阶级基础。发展资本主义仍然是此时代具有进步意义的主流声音。

中国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表现证明了他们无力改变中国的面貌,中国社会在资本主义制度环境下的现代化之路并没有走通,外国资本主义的缺陷在发展中日益暴露,以及俄国革命的示范和支持作用等原因,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五四”运动之后异军突起。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了一个现实的选择。这标志着中国社会开始转向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环境下的现代化道路。新民主主义理论就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产物。新民主主义虽然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但同时又是以社会主义为发展的前途。这样,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被最终确定下来。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创建就是对中国走非资本主义制度下现代化道路的可贵探索。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实施表明中国共产党放弃了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努力,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所以,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现代化不能等同于资本主义化。中国现在走的就是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是处在一个对现代化道路的摸索阶段,这个阶段,现代化的主导力量是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则是希望把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需要与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结合起来,本质上是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所以,把现代化局限并等同于资本主义化就抹杀了历史发展的丰富性。而正因为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现代化模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意义才更显突出,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实践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风险也非同一般。为此,邓小平再三告诫全党,我们的四个现代化,不要忘记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2]173}

三、救亡与启蒙的辩证统一

著名的救亡与启蒙之争是源于当代学者李泽厚。他认为,从维新运动到革命运动,推翻清朝,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知识分子群体关注的焦点。其他一切,包括启蒙和文化,很少有暇顾及。“五四”时期启蒙与救

亡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剧烈的现实斗争和时代的危亡局势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一次又一次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3]李泽厚的这个命题与近代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确实存在着相当的契合之处,其基本的立足点就是对中国专制主义影响的反省和担忧。

首先,启蒙与救亡并不仅仅相互对立,也是互相贯通的。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性,即使是中国传统社会走向没落的时期,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于传统思想文化的反省并不充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动力也不强大。只有到了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启蒙的声音才显得格外响亮。这样,启蒙不得不与救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启蒙为了救亡,救亡需要启蒙,救亡本身也成为了一种启蒙。没有救亡的压力,启蒙就没有了动力;失去了启蒙,救亡就迷失了方向。

其次,李泽厚所说的启蒙指的是启资本主义之蒙,也就是说要引入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国家进行思想和理论准备。而这种资产阶级理论体系构想是美好的,但是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中要么是遇到挫败,要么就是完全走了样,在数次的思想论战中也遭失败。所以,这种启蒙已经不是当时中国的现实需要。建立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努力在实践中的失败更使得资本主义性质的启蒙遭到国人的摒弃。与此相对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与诸多引自西方的思潮的斗争和试验中树立了它的指导地位,成为了中国人民的选择,适应了中国的现实需要。

再次,任何启蒙都是相对的,西方的启蒙运动是与资本主义兴起相呼应的,是消灭封建主义的蒙昧,立资本主义之原则的启蒙。而资本主义的原则本身也是历史的,不是永恒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启蒙运动在树立起资本主义原则的同时,也是被披上一层资本主义“永恒、美好”之“魅”。而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基础上诞生的,正是祛资本主义之“魅”,揭露资本主义民主、平等、自由的虚伪性和局限性。另外,由于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方的前资本主义时期在政治、经济结构和思想文化传统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反封建”的内容和目标也不尽相同,在救亡的急迫需求下如何开展启蒙,开展何种启蒙完全是一个新的课题。在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人自觉选择的条件下,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固有矛盾已经日益激化和显露的时代,中国人既要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成果,也需要对其进行反省,而不是全盘接收,重复西方的老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去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蒙,立马克思主义之原则才能解决中国的救亡问题,才是中国应有的启蒙。

四、从“中体西用”、“全盘西化”到“新体新用”

中国人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存在着以中央帝国自居、盲目排外的自我中心主义,在持续的挫折面前又产生出对传统进行严厉批判的“全盘西化”,也就是西方中心主义。这两种思想的交锋贯穿于近现代中国人的发

展探索中。中国近代历史从思想观念上看也是中国人从传统的天下观的解体到新的天下观的形成的过程。

面对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封建统治者也意识到这是一场“数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数千年”,意味着传统的稳固,“大变局”,意味着变革的必然性和彻底性。之所以具有“彻底性”,是因为这不仅是政权的更迭,更是对中国人世界观的改造。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与东方传统文化之间的交锋不可避免。就中国人自身而言,从鸦片战争开启了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沦落开始,保守势力和进步势力、中国中心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传统与反传统的较量就开始了。其逻辑演变过程表现为在封建社会里中国传统的、狭隘的天下观经过一系列思想和实践的冲击和演变,逐步形成全球视野的新天下观的过程。其具体的演变路径是:中国中心论(顽固保守势力)——中体西用论(地主阶级改良派)——西方中心论(如:胡适,梁实秋)——非西方论(如:梁启超,孙中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如毛泽东、邓小平)——和谐世界论(当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于是发展成具有全球视野的新天下观。

从近代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转折过程来看,中国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都不能实现民族的复兴。当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时候,他就已经在把来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找到了一条既改造中国传统又不照抄西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了。也就是说,中体西用解决不了中国的发展进步,全盘西化也不可能,只有“新体新用”才能解决中国的发展进步问题。这个“新体新用”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吸收中国传统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当中共新一代领导人提出和谐世界理论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想起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和谐世界理论完全不是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它是中国人经过一百多年的思想斗争和实践斗争所总结的新的天下观,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所作的总结性认识。

综上所述,对于近代中国面临的这场历史转折,是一个复杂的、独特的社会转型过程。既是一个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也是一个由被压迫到通过革命获得解放的过程;既是一个中西文化碰撞的过程,也是一个启蒙与救亡的过程。这种过程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长期性、艰难性。这并不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挑战,反而正是从不同侧面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证。

参考文献:

- [1] 罗荣渠. 现代化新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3] 李泽厚.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 上海: 三联书店, 2009.

(责任编辑 文双全)